

第一篇

文 学

四川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几千年来,四川人民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几度出现了社会文化的辉煌时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

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最早最丰富的是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据蒙文通考证,《山海经》中的《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和《海内经》均为巴人作品。在袁珂《中国神话资料萃编》的《古蜀编》中,辑纳了典籍中有关巴蜀的神话传说。从这些神话传说中,反映出古时巴蜀人的生活和斗争,也反映了巴蜀两个地区人民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心理素质和民族特征。这些神话传说和故事,已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公元前316年(周慎王五年)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成一种既与中原文化有某种联系又与之迥然

不同的文化体系。这种独特文化体系发展至西汉,显示出鲜明的特征,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文学领域最著名的杰出代表人物,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以辞赋驰名于世。西晋时陈寿著《三国志》,东晋时常璩著《华阳国志》。盛唐时陈子昂、李白,五代时赵崇祚、李洵、欧阳炯,宋代时苏洵、苏轼、苏辙,明代的杨慎,清代的彭端淑、李调元、张船山等,均以其精湛优美的诗词、文章流传后世。至于历代曾客寓巴蜀,创作了大量传世名篇的文化名士,则有唐代的杜甫、刘禹锡、白居易,宋代的黄庭坚、陆游等。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西学东渐,一些主政官吏、维新变法之士,倡导洋务,兴学育民,以期图强救国。其间代表人物有参加变法维新而遭杀戮的著名学士杨锐、刘光第,耿直敢言的文

人赵熙,以文抒情、开启民智的学人宋育仁、廖平、吴虞、杨道南和《革命军》的著述者邹容等。

进入20世纪后,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四川保路运动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胜利进程,结束了清朝的统治。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文化思潮的帷幕,其间著名代表人物有反封建礼教的斗士吴虞,倡导蜀学反帝救国的吴之英,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一代诗杰杨沧白,立宪宿将、晚节留芳的新文艺教育家蒲殿俊等。新文学的倡导哺育了一代新人,培养了一代新作家,20年代有郭沫若、李劫人、吴芳吉、林如稷,30年代有巴金、艾芜、沙汀、周文、何其芳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成为

抗战大后方,大批文坛名人汇集巴蜀,抗战文学新作相继问世,文学社团相继建立,文学期刊相继创办,再次出现巴蜀文化繁荣兴盛时期。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四川文坛老一代文学家笔耕不辍,著述丰盛,取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同时,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川籍著名诗人、作家重返故里。其代表人物如邵子南、戈壁舟、马识途等,先后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巨著和诗篇。一批年轻作家和诗人相继出现,创作了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其成就突出的代表人物如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作者周克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作者高缨,诗人流沙河、孙静轩、梁上泉等。

第一章 沿革

第一节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先前以时文制艺谋求功名利禄的锦江书院教授目标,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1874年5月,丁忧回川的薛焕(工部侍郎),联络本地官绅,上书申请创办“尊经书院”,得到当时四川学政张之洞的大力支持。湘潭著名学者王闿运前后3次入川,担任书院主讲有8年之久。书院抛弃了锦江书院以学习八股为主的教学方法,强调经世致用,除教授今文经典作品之外,还开设数理化学科,重视词章和写作,一时之间“学校大兴,人才蔚起,文化之程,翹然为西南各省最”(张之洞语)。尊经书院从1875年正式开办到1902年和锦江书院、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不到30年时间,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为四川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不少有志之士出国留学,尤以赴日学生最多。

他们中,有的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以诗文抒发革命豪情,如《革命军》的著者、巴县人邹容。

1906年,川籍留日学生雷铁崖、董修武等在日本创办刊物《鹃声》,这是继同盟会会刊《民报》之后又一革命刊物。刊物号召“革命排满”,称康有为、梁启超为“保皇派”,与之作思想上的决裂。出版十余期后,清使通过日本当局,严加查禁。次年底,留日的荣县人吴玉章,联络原《鹃声》杂志的雷铁崖、邓絮,办《四川》杂志,在日本东京设事务所,又在成都、重庆设支社,时人称为“西南半壁警钟”。虽然只出了三期即遭日本当局查禁,但对四川知识界的觉醒,功不可没,像雷铁崖的《警告全蜀》(第1期)便是传诵一时的好文章,“即使是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而绝少无聊的吟风弄月之作”(吴玉章)。如龙鸣剑《题〈四川〉杂志》、《过香溪谷》等著。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却被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他为复辟帝制,掀起“尊孔读经”的浪潮。一些清朝遗老、封建余孽,纷纷成立“孔教会”、“孔圣会”等团体。连先前一些积极主张变法维新的重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四川的宋育仁、徐炯等等也都卷入这股浪潮,担任起这些团体的首领来。面对这股逆流,一批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激进青年,冲上了思想战线的前沿阵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9月改名《新青年》),反对尊孔复古,反对三纲

五常的封建礼教,倡导文学革命。在四川,走在前列的主要人物是新繁吴虞。他从1917年开始在《新青年》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系列文章,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除写作政论文字外,还有不少诗文,他与妻子曾兰合著小说《孽缘》(1914年载《小说月报》)。生前自编《文录》五卷,诗《秋水集》一卷。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虞集》和《吴虞日记》。

第二节 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五四运动促进了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四川新文化运动集中表现在反对封建礼教,改革学校教育,提倡妇女解放和文学革命等几个方面。当时四川报刊《星期日》、《四川学生潮》、《威克烈》、《半月》、《直觉》等,积极宣传民主和科学,抨击封建礼教,宣传妇女解放,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这些刊物维持的时间不算长,但影响颇深,它们和《新青年》等刊物,哺育了一代新人,也培养了一代新作家。

五四运动对四川文学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五四运动之后,四川许多觉醒的青年纷纷走出夔门,其中有不少人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20年代有

郭沫若、李劫人、吴芳吉、康白情,以及“浅草”、“沉钟”社的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后期创造社的邓均吾等等。

30、4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成熟、空前繁荣的时代,四川也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人才。

抗战爆发之前,全国的文学活动中心在上海、北京,而四川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显得相当沉闷。走出夔门的川籍作家却活跃于中国文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巴金、艾芜、沙汀、周文、任白戈、何其芳、罗淑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重庆是战时的陪都。全国许

多文化团体和大批文化人士汇集到山城,使重庆成为抗战文化的中心。在当时任中国共产党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领导下,在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指导下,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团结广大文化界朋友,开展了蓬勃的进步文化活动。其间,成渝等地先后成立了抗战文化社团,陆续创办了诸多文学期刊。其中最著名的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原》,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孔罗荪主编的《文学月报》,胡风主编的《七月》,熊佛西主编的《文学创作》,周文主编的《文艺后防》,蔡月牧主编的《华西文艺》等。这些期刊发表了大量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虎符》、《孔雀胆》和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老舍的“通俗说唱”文学作品和话剧《面子问题》,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蜕变》、《家》,夏衍的《法西斯细

菌》,陈白尘的《石达开》和茅盾的《清明前后》以及艾青、田间等人的诗歌等等。这些作品有力地鼓舞了后方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和信心,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和投降暗流。

这一时期,四川还出现了不少文学翻译家,如罗淑的译文集《何为》和节译本《白甲骑兵》。陈敬容在抗战后即从事文学翻译,翻译的外国名著有《巴黎圣母院》、《绞刑架下的报告》、《安徒生童话》、《太阳的宝库》等。此外,赵景琛早年即从事民间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小说论集》、《宋元戏文本事》等。

战时汇集到四川的外地文人学士,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各返故里,一些文化社团组织和期刊,也随之转移或自行解体、停办。后来国统区社会动荡,战乱纷繁,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甚,四川文化活动趋于低潮,留居川地的文化界人士,苦撑局面,继续进行艰苦奋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底,解放大军入川,带来了老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它们以健康的、民主性的内容和新鲜活泼、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受到群众喜爱,全省城乡掀起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的热潮。

在文学创作上,强调“普及第一”,着重抓了通俗性的、密切配合当时政治中

心任务的演唱作品。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四川文艺思想活跃起来,创作有了起色。老一辈作家取得了新的成就,艾芜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短篇小说集《夜归》,沙汀有短篇小说《卢家秀》、《过渡》,李劫人修改了旧

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开始重写《大波》。年轻作家和诗人崭露头角，雁翼有诗集《大巴山的早晨》、《在云彩上面》，孙静轩有诗集《海洋抒情诗》、《唱给浑河》，傅仇有诗集《森林之歌》、《雪山谣》，流沙河有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和短篇小说集《窗》，克非、化石、揭祥麟的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影响。

1957年的“反右”，使一批文学工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创作受到影响。

1961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了《文艺十条》，重申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肯定评价。四川文学再次出现高潮。长篇小说有《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大波》（李劫人）、《清江壮歌》（马识途）、《逐鹿中原》（柯岗）。短篇小说有《一场风波》（沙汀）、《老三姐》、《最有办法的人》（马识途）、《南行记续篇》（艾芜）、《山高水远》（高缨）等。诗歌有《山歌传》（戈壁舟）、《山泉颂》、《白杨颂》（梁上泉）等。古典文学研究有《国故论衡疏证》、《养晴室笔记》（庞石帚）。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也出现了一批较好的作品。文学评论方面，对

“诗歌下放”的讨论和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协”组织陷于瘫痪，作家遭到迫害，作品被封存，文艺刊物被迫停刊，文学创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直到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后，文学工作才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80年代是四川文学迅猛发展的时期。从“文革”结束到1990年，作协四川分会的会员由120余人，增加到近千人。其中，全国会员由25人增加到125人。文学期刊除1973年复刊的《四川文艺》外，大型文学期刊《红岩》、诗刊《星星》已相继复刊。各县、市、州也都有文学期刊创办。在各种文学样式的全国性评奖活动中，都有四川作家的作品获奖。省内也举办了两次优秀文学作品评奖。在连续几次全省社科优秀研究成果评奖中，文学研究成果占了重要的一席位置。少数民族文学、军事文学、少儿文学、文学组织工作、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内文学界的交流也都全面展开。80年代是四川文学又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

第二章 文学创作

第一节 诗 词

一、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诗词创作

清代康、乾、嘉、道之际,全国文学丕兴,作者如林,而一向以诗词享誉国中的巴蜀地区却处于滞后的境地,直到同治十三年尊经书院的创办,蜀士向学之风大盛,文学开始走向繁荣。吴虞在《重印曾季硕〈桐风集〉序》中举列的名山吴之英(字伯竭)、井研廖季平、德阳刘建卿、富顺陈元睿、新津周雨人、酉阳陈子京、华阳顾印愚、成都胡念孙、汉州张子馥、绵竹杨叔峤等,文学(主要是诗歌)上的成就不仅在蜀中,就是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尤其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戊戌六君子”中蜀人居其二,他们的诗文在京城“震迈一时”,为巴蜀文学创作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杨叔峤诗集》 作者杨锐(1857~1898),“戊戌六君子”之一,字叔峤,绵竹县人。著有《北征日记》一卷,《征学笔

记》一卷,在后人沈宗元编辑的《刘杨合刊》中《杨叔峤文集》收赋、文29篇,《杨叔峤诗集》收诗250余篇,其中如《前蜀杂事》、《红叶》是他的代表作。

《衷圣斋文集》 作者刘光弟(1859~1898),字斐村,富顺县人,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衷圣斋文集》、《衷圣斋诗集》(又名《介白堂诗集》)均收入沈辑《刘杨合刊》,其中《梦中》、《遗愤》、《峨眉最高顶》等诗,广为传诵。

《香宋词》 作者赵熙(1867~1948),字尧生,荣县人。早年写诗,后著《香宋词》三卷,改编川剧《情探》,留传至今。

《沧白诗钞》 作者杨庶堪(1881~1942),字品璋,又名沧白,巴县人。政治家兼诗人。著有:《沧白诗钞》、《杨庶堪诗文集》(台湾四川文献出版社出版)、《沧白先生诗绝句百首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他诗作 大足饶国梁(1888~1911,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诗《别家》,新繁吴虞的《辛亥杂诗》(《秋水集》),成都岳钟琪的边塞诗《姜吟集》等,都是一时的名篇。此外,林思进(1873~1953)一生致力于创作,尤以诗、词卓有成就,著有《清寂堂诗录》、《清寂词录》等。李惺(1787~1864)著述甚丰,其弟子汇刻其为文6卷、诗2卷,附以时文、试贴,取名《西汇全集》。张光厚(1881~1932)早年东渡日本,在日本写了不少诗,回国后加入柳亚子等组织的“南社”,是该社的著名诗人之一。

二、五四运动至抗战前夕的诗词创作

《女神》作者郭沫若(1892~1978),乐山沙湾人。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2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次年和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与国内的文研会并立为中国文坛两大组织。1923年从日本九州帝大医科毕业归国,在上海从事文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从事学术研究和翻译,支持国内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归国,出任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文艺界团结抗战的一面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此一时期的诗集除《女神》外,有《星空》(1923)《前茅》(1928)《瓶》

(1927)《恢复》(1928)等。

《婉容词》作者吴芳吉(1896~1932)江津县人,号白屋。十岁能诗,以“神童”名噪乡里。在京、津、沪、长沙等地流离途中写了大量诗作,在五四以前已是全国有名的诗人。1919年秋所作《婉容词》、《护国岩词》、《两父女》等,传诵一时。他的诗词,语言通俗浅近,琅琅上口,融古典词与民歌为一炉,寓新内容于旧形式之中,堪称新诗运动中的奇葩。遗著有《吴白屋先生遗书》、《白屋嘉言》、《白屋家书》、《白屋诗选》。

《草儿》作者康白情(1895~1945),安岳县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后与罗家伦、傅斯年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此时期发表大量诗作,1920年赴美留学,在美担任美洲中国文化同盟主任,并与同乡康纪鸿和张闻天等创办中文《大同报》,又组织“新中国党”。诗集有《草儿》(1922)、《草儿在前》(1923)、《河上集》(1924)。

《浅草》季刊 创办者之一的邓均吾(1898~1969)原名邓成均,古蔺县人。1920年,去上海泰东书局编译所工作,随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1922又与林如稷、陈翔鹤等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文艺季刊,发表诗作多首。《邓均吾诗词选》于198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精选了他1922~1968年间的新诗、旧体诗246首。

《草堂》杂志 创刊人叶伯和(1889~1945),原名式昌,郫县人。1907年毕业于于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同年赴日留学,攻音乐专业。1914年归国后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音乐专科,以白话写歌词,后写白话诗。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成为中国新诗最早的开拓者之一。1922年夏秋,发起成立草堂文学研究会,创办《草堂》杂志,是四川第一个新文学团体和纯文学刊物。诗集有《诗歌集》(1920)、《伯和诗草》(1924)。诗通俗浅近,音乐性强。

《蜀雅》作者周岸登(1873~1942),威远县人。1913年著成第一部词集《邛都词》。以后陆续创作了《焯梦词》、《南潜词》、《海客词》、《江南春词》等。1930年,将其历年词作重新勘定,整理出版了《蜀雅》12卷,附《别集》2卷,收词218首。

其他诗作 “五四”时期,王光祈在《少年中国》上表过不少旧体诗和白话诗,如《夔州杂诗》、《与友人黄廷锐登陶然亭赋诗二首》、《去国辞》、《寄内》等。周太玄在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之余写了不少诗歌,如《过印度洋》(载《少年中国》杂志,1卷2期,1919年曾被作曲家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迄今仍选入中学课本)、《去年八月十五》、《黄蜂儿》都曾入选北社所编《一九一九年新诗选》,前者还选进《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以小说闻名于世的巴金,早在1922年前后就曾在上海《时事新报》和成都《草堂》、《孤吟》等报刊上发表过几组新诗。“浅草——沉钟社”的林如稷(最早署名白星),发表了《长啸篇》、《狂奔》等不少诗作,陈

炜漠的《甜水歌》(载《浅草》3期,1923年),是出自四川作家之手较早的长诗。女诗人陈敬容,1948年与友人编创了《中国新诗》月刊及《森林诗丛》,诗集有《老去的时间》、《交响集》、《盈之集》、《远帆集》等。刘师亮著有《师亮诗草》、《时彦声律启蒙》、《师亮竹枝词》等。

三、抗战时期诗歌创作

抗战爆发,重庆、成都成了后方的文化重镇,诗歌创作、诗歌团体和诗刊以及诗的朗诵和研讨都相当活跃。

“平原诗社” 1942年成立于成都,社长周太玄,主要成员有芦甸、寒笳、蔡月牧、白堤、若嘉、任耕、杜谷、左琴岚、葛珍、孙跃冬、方然、范方羊、羊犖、无以、青术林、许伽等。前身是“华西文艺社”(1939~1940)。先后出版过《涉滩》(1942年)、《五个人的夜会》两本诗集和几期《平原诗页》。

“诗垦地社” 1942年2月2日,该社创办了《诗垦地》(《国民公报》副刊〈文辟〉供给版面),主编邹获帆、姚奔。主要成员有杜谷、方然、扬禾、白堤、绿原等。1943年5月29日,《诗垦地》出至25期终刊。

《诗歌丛刊》 1942年5月创刊,郭沫若、王亚平编辑。出版了《春草集》、《夏叶集》。后改为《诗家丛刊》,出版了《诗人》、《星群》两集。

“诗报社” 1937年12月成立并出版《诗报》。是抗战爆发后四川最早的诗歌团体。主要骨干李华飞、覃子豪。《诗报》

仅出一期便停刊了。

其他团体和刊物 由外地来川创办和由外地迁来的诗团体和刊物还有《中国诗艺》(1938年8月创办于湖南,1941年迁渝复刊,共出4期,由徐迟、冯至、邹荻帆等编辑、撰稿)。(《诗丛》(1942年3月~1945年5月,宋璠等编辑)。(《诗文学丛刊》(1945年2月创刊,邱晓松、魏荒弩主编,先后出《诗人与诗》、《为了面包与自由》两集)。(《七月》与《希望》(1939年,《七月》由武汉迁渝,1945年1月改出《希望》,胡风主编,主要撰稿人有艾青、鲁藜、杜谷、田间等,虽是综合性文艺刊物,但以诗歌影响最大,形成了“七月诗派”)。

重要诗歌活动 1937年12月4日,由《诗报社》发起召开“抗战中的诗歌阵线”讨论会。

1938年10月~1939年3月,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了6次诗歌创作讨论会。

1941年,“抗敌文协”诗歌组倡议以旧历五月五日为中国诗人节,得到广泛支持。

1941年9月14日、26日,重庆诗歌界举行了两次学术研讨会。

1942年和1943年,由“文协”与“文工会”出面召开诗歌座谈会,专题讨论新诗的继承和借鉴问题。

1945年11月14日,《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以《毛词·沁园春》为题,首次发表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接着,《大公报》转载同时,还刊出柳亚子《沁园春》和

词。《新民晚报晚刊》发表郭沫若和词《沁园春》。

诗歌创作 郭沫若出版了《战声》集(1935年1月)、《蜩螗集》(1948年9月,抗战后期诗)。一大批新人新作崭露头角,其中有:

何其芳(1914~1977),万县人,中学时代爱好新文学作品,开始新诗创作。1930年秋入北大哲学系,致力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受“新月”派诗歌影响。1936年,与卞之琳、李广田合出《汉园集》得到好评。同年,散文集《画梦录》获《大公报》文艺奖金。抗战爆发回到万县,与杨吉甫合办《川东文艺》周刊(《川东日报》副刊)。1938年,到成都与卞之琳、方敬办《工作》半月刊。他的著名诗作《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就发表在该刊上。同年8月与沙汀、卞之琳同去延安,出版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抗战后期被派到重庆,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写了不少文艺论文(收入解放后出版的《关于现实主义》)。

方敬,万县人。主要作品有诗集《雨景》(1942)、《声音》(1948)、《行吟的歌》(1948)、《受难者的短曲》(1949)。

李华飞,原名李明诚,巴县人。1935年发表诗《渡洪江》,1945年与王亚平、柳倩等合出诗集《星群》,是战时较活跃的诗人。

杜谷,原名刘令蒙,有诗集《泥土的梦》(1941),后收入胡风主编的“七月诗

丛”。

此外,穆仁(杨本泉)的诗《早安啊,市街》(1946)、许伽的诗《古城,我爱你》(1942年)、陈道谟诗集《诚实的歌唱》和散文诗集《眷春集》、乔大壮的旧体诗词集《波外乐章》、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巴金的新诗《给死者》(1937)、以及艾芜的《我怀念宝山的原野》(1937)都是抗战时期值得纪念的诗作。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诗歌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辈诗人,如邓均吾、方敬、山莓、李华飞等不时有诗作问世,而一大批新人相继登上诗坛,成为四川诗歌创作的主力军。

50年代初期,四川诗歌多是一些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50年代中期,年轻一代诗人逐渐成熟起来。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四川诗歌创作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其后,经历了“反右”的挫折,经历了“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冲击。在“天天讲”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下,诗歌创作一度脱离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但总的看来,诗歌创作仍是四川文学界成绩较大的一个门类,新出现的,具有全国影响的诗人也是比较多的。

老诗人的诗作 在这个时期,方敬出版了《拾穗集》(1981)、《飞鸟的影子》(1990)。李华飞有《归来者心曲》、《一株海草》、《孔雀、孔雀》、《八十行星之外》和

《李冰之歌》。戈壁舟(1916~1986)有诗集《别延安》(1951)、《延河照样流》(1956)、《黑海赞歌》(1958)、《岩上青松》(1958)、《宣誓集》(1959)和长诗《三弦战士》(1956)、《山歌传》、《登临集》(1963)、《延安诗钞》等。此外,刘孟伉有《冉溪诗稿》(1924~1946)、《矜隐集》(1948)、《庚辛坠稿》(1950~1961)、《壬寅汇稿》(1962)及《冻桐花馆词钞》等,均在“文革”以后才在书刊上公开发表和选载。

青年诗人的作品 傅仇:主要作品有诗集《森林之歌》(1955)、《雪山谣》(1956),长诗《珠玛》(1959)、《伐木者》(1964)。孙静轩:先后出版了诗集《唱给浑河》、《沿着海岸沿着峡谷》(1956)、《海洋抒情诗》(1958),长诗《黄河的儿子》、《七十二天》,1985年后出版《孙静轩抒情诗集》、《孙静轩诗选》。雁翼:有诗集《大巴山早晨》(1955)、《江海行》、《时代的纪实》、《南国的树》、《白杨林风情》、《白杨颂》(1966)、《雁翼诗选》(1988),及长诗《紫燕传》等。高纓:有长诗《丁佑君之歌》(1958),诗集《大凉山之歌》等。流沙河:有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1956)、《流沙河诗集》(1982)、《独唱》(1989)。梁上泉:有诗集《喧腾的高原》、《云南的云》、《开花的国土》、《大巴山月》(1957)、《山泉集》(1963)、《在那遥远的地方》、《爱情、人情、风情》(1982)等。王余有《高原散歌》(1954)。陆荣有诗集《灯的河》(1962)、《重返杨柳村》(1964)。彝族诗人吴琪拉达有《月琴的歌》、《孤儿之歌》、

《奴隶解放之歌》。傅天琳(女)有诗集《绿色的音符》(1988)。杨牧有诗集《复活的海》(1983)、《野玫瑰》(1983)、《雄风》(1987)、《边魂》(1987)、神话叙事长诗《塔格莱丽赛》(1986)。吉狄马加(彝族)有诗集《初恋的歌》、《吉狄马加诗选》。周纲有诗集《大渡河情思》(1983)、《黄金马蹄》(1989)。女诗人王尔碑有《美的呼唤》、《行云集》(散文诗)。唐大同有《日照大江流》、《希望的国土》、《我思念着白云》、《唐大同散文诗选》、《唐大同诗选》。沈重有《晚开的黑月季》。王志杰有《高原的风》、《深秋的石榴花》。李加建有《人和大地》、《我在每一个早晨诞生》。杨山有《黎明前的抒情》。余薇野有讽刺诗《辣椒集》。木斧有《醉心的微笑》、《美的旋律》、《木斧诗选》。戴安常有《西天的云彩》、《独叶草》。胡笳有《黑色的海》。刘滨有《我的爱在南方》。白航有《风雨篇》。陈犀有《浯屿联想》。能远柱有《炼血》。徐康有《耕耘期的抒情》、《爱意徊徨》。徐国志有

《五色土》(多人合集)、《留在红叶上的梦》。张新泉有《男中音和少女的吉他》。张建华有《玫瑰雨季》。柯愈勋有《太阳从大地升起》、《命运之河》、《跋涉者的沉思》。程宝林有《未启之门》。鄢家发有《蝴蝶帆》。魏志远有《雪野》,等等。

此外,廖亦武、翟永明、曾晓嘉、杨然、何小竹等的诗作,也受到人们的关注。

儿童诗歌创作 有老诗人张继楼在60年代的《夏天到来虫虫飞》等。有新时期赵敏的诗集《神奇的世界》、黄继先的《一只想变人的猴子》、彭万洲的《不愿做短尾巴的狗》等。

古体诗词创作 有郭沫若的旧体诗词《潮汐集·汐集》(1959)。老诗人张秀熟、段可情、邓均吾、李亚群、缪钺、黄稚荃都曾有新著发表,并出版了何鲁(遗著)诗词选、刘孟伉(遗著)诗集。尤其在“文革”结束之后,一批退休的老干部,何郝炬、李维嘉等组织“岷峨诗社”出版《岷峨诗稿》(已出30余册)。

第二节 小说

一、从晚清到民国的小说创作

四川古典小说极不发达,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清代中后期,双流傅振拓的《平寇志略》、《皇城坝》,崇庆徐抱兰的《蜀州志异》,金堂柳慕龙的《南路烟尘》等,影响和成就都不大。

清末变法维新运动中,四川报业有

了发展,小说开始受到重视。吴虞在为富顺刘长述所作《松冈小史》写的序中说:“小说之在社会,其势力远过于六经,又恶有所谓‘君子不为’者乎?”(《吴虞集》)李劫人、曾兰(吴虞之妻),都是此时期开始小说创作的。

《游园会》 作者李劫人(1891~

1962),成都人。1912年在成都《晨钟报》以老懒的笔名发表处女作《游园会》。接着,有《儿时影》(1915)、《做人难》(1916)、《盗志》(1916)、《续做人难》(1917)、《强盗直论》(1918)和一篇文言小说《‘夹贝’》(1915)。“五四”时主编《川报》,率先响应新文化运动。他与王光祈、周太玄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成都分会会长,创办《星期日》周刊。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继续从事写作和翻译。1924年回国寓居成都,先后在《少年中国》、《东方杂志》、《醒狮》、《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北新》等全国性刊物发表小说。短篇《编辑室的风波》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抗战前夕完成了划时代的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3部长篇。

《孽缘》 作者曾兰(1914年载《小说月报》6卷10号)。小说“叙事明晰,用笔犀利”、“箴砭社会”,在当时全国小说创作中属上乘之作。

《将过去》 作者林如稷(1902~1976),资中县人。1921年,考入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次年与陈翔鹤,冯至等发起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1923年赴法留学。1930年回国,继续参加沉钟社工作,写小说兼从事翻译。短篇《将过去》入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解放后出版有《林如稷选集》。

《不安定的灵魂》 作者陈翔鹤(1901~1969),重庆人。1925年,邀集浅草社同人在北京组织沉钟社,出版过《不安定的

灵魂》(1927)等多部小说和多种翻译作品。解放后作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主编。有《陈翔鹤选集》。

《信号》 作者陈炜谟(1903~1955),泸县人。1921年考入北大英文系。出版过《信号》、《炉边》等小说集。其中《狼筴将军》、《破眼》、《夜》、《塞堡》入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灭亡》 作者巴金(1904~),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成都人。1927年初赴法留学。次年写出第一部小说《灭亡》。1929年回到上海,开始职业创作生涯。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家》、《春》、《秋》、《憩园》、《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文集》26卷。作品译成日、英、法、俄、德、朝、匈等十几种文字,先后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法国“圣十字勋章”、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日本福冈亚洲特别贡献奖等。

《南行记》 作者艾芜(1904~1992),新繁县连丰乡人,原名汤道耕。早年曾在云南、缅甸漂泊生活,1932年春,在上海参加“左联”。1933年3月,被国民党逮捕。6个月后,经鲁迅出资请史良律师辩护获释,从此走上职业创作道路。主要作品有短篇集《南行记》、中篇集《丰饶的原野》、长篇《故乡》、《山野》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艾芜文集》10卷。作品译成日、英、俄、德、朝、匈等多种文字,在东南亚享有盛誉。

《淘金记》 作者沙汀(1904~1992),安县安昌镇人,原名杨朝熙、杨只青。

1929年赴上海,参加创办辛垦书店。1931年和艾芜一道去信向鲁迅请教文学创作,得鲁迅指导。1932年冬加入“左联”。有《在其香居茶馆里》等多部短篇及长篇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和报告文学《记贺龙》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沙汀文集》(6卷)。

《救亡者》 作者周文(1907~1952)荣经县人,原名何稻玉,笔名何谷天。1933年在安徽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组织部长。后赴上海参加左联,得鲁迅指导,用何谷天署名发表作品。有小说《救亡者》、《雪地》、《山坡下》等。抗战后回川,组织成都文艺界联合会、抗敌文协分会,主持会刊《笔阵》。著作有小说、散文、理论多种,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文选集》(上、下集)。

《生人妻》 作者罗淑(1903~1938),女,原名罗世弥,简阳人。1929年留学法国。1933年归国后,写了多篇短篇小说。去世后,巴金代为搜集出版了《生人妻》(1938)、《地上的一角》(1939)、《鱼儿坳》(1941)3部集子,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淑选集》。

《卮字旗下》 作者刘盛亚(1915~1960),重庆人。1935年处女作《白的笑》发表于《文学季刊》。后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1938年归国,写了揭露德国法西斯的小说《卮字旗下》和《小母亲》,长篇小说《夜雾》等。解放后从事专业创作,因发表《再生记》受到批判。1957年错划为

右派,在“劳教”中去世,遗著《刘盛亚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勇大摆地雷阵》 作者邵子南(1916~1955),原名董尊鑫,资阳人。1938年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1942年写《李勇大摆地雷阵》。后由东北书店出短篇小说集。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邵子南选集》。

此外,刘涟清(1909~1939)在30年代就发表了一批小说,成名作是反映四川军阀混战的《我们在地狱》,该小说被鲁迅、茅盾收入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中,继后又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出版有小说集《黑屋》。李红(1902~1961)原名李寿民,四川长寿县人。1932年以“还珠楼主”署名在天津发表处女作《蜀山剑侠传》一举成名。其代表作还有《云海争奇记》、《蛮荒侠隐》、《青城十九侠》等,相继撰稿出版数十部武侠小说,是现代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小说创作

(一)老一辈作家的创作

李劫人 从1954年起即在公余时间开始重写《大波》,直到1962年去世时尚未完成。《大波》旧版出版于1937年,拟出4卷,只完成3卷,抗战开始即停。新版扩大了生活面,使之更带史诗价值,成了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社会一幅全景式的立体油画。

巴金 建国后的创作成就主要在

散文、随笔方面,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一本《英雄的故事》(1953),一本《李大海》(1962)。

艾 芜 建国后创作成就较突出,有短篇集《夜归》(1958),长篇小说《百炼成钢》(1958),短篇集《南行记续篇》(1983),长篇小说《风波》(1987)。

沙 汀 在建国初期创作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过渡集》和电影文学剧本《焊茶壶的人》。1979年后,连续写了3个中篇《青杠坡》、《木鱼山》、《红石滩》,集成《走出牛棚以后》(1989)。

陈翔鹤 1954年调北京,主要从事编辑工作。1962年前后,写了两篇历史题材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后收入《陈翔鹤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刘盛亚 1951年在《新民报》发表连载小说《再生记》,以后写了长篇小说《木工黄荣昌》和短篇《悬崖标灯》、《星》等。

(二)建国初期新作家的作品

《红岩》 作者罗广斌(1924~1967),成都人。1950年起即开始报告文学写作。1958年发表《在烈火中永生》(与刘德彬、杨益言合著)。1961年写成长篇小说《红岩》(与杨益言合著)。

《清江壮歌》 作者马识途(1915~)忠县石宝乡人。建国后开始小说创作,先发表了《老三姐》、《最有办法的人》等短篇小说,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创作的主要作品有短篇集《找红军》、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中篇小说《三战华园》、长篇小说

《夜谭十记》、长篇小说《巴蜀女杰》及《雷神传奇》、《秋香外传》等。

《秘密世界》 作者杨益言(1925~),重庆人,继合著《红岩》后有续著长篇小说《秘密世界》、《大后方》。

《春潮急》 作者克非,原名刘绍祥(1930~),眉山东馆镇人。1955年开始发表反映农村题材小说,曾与人合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阴谋》。主要作品有《春潮急》(长篇)、《山河颂》(长篇)、《野草闲花》(长篇)、《鸦片王国沉浮记》(长篇)、《牛魔王的后代》(中篇)以及《头儿》等短篇。

《达吉和她的父亲》 作者高缨(1927~)天津人,早年入川。先写诗。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山高水远》(短篇集)、《云崖初暖》(长篇)、《兰》(中篇)。

《上天桥》(儿童文学作品) 作者揭祥麟,发表的作品还有短篇《桂花村的孩子》、《牛车少年》等。

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经涌现出一批来自工、农、兵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在省内外都得到一定好评。如工人冯还求的《红玉》、《故乡》(1959),农民毋成玉的《少年》(1963)等。

(三)1977年以来的新人新作

1977年以来,是四川文学大发展的时期。老一辈作家笔耕不辍,中年作家继续推出新著,新的年轻作家一批接一批涌现出来。

《许茂和她的女儿们》 作者周克芹(又

名周克勤,1936~1990),简阳人。1958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79年调四川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石家兄妹》(短篇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长篇,获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周克芹短篇小说集》(其中《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连续两届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二丫和落魄秀才》(中篇小说集,获1988年四川省首届郭沫若文学奖)、《秋之惑》(长篇)(由中篇《果园的主人》和续篇《秋之惑》合成)。

《赤胆忠心》 作者王火(原名王洪溥,1924~),原籍江苏。1983年调四川工作后,完成了“战争与人”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之一《月落乌啼霜满天》(人民文学社出版),曾获1988年四川省首届郭沫若文学奖。

其间还有榴红(原名王振华),早年写儿童文学。“文革”后,出版短篇集《燕子啁啾》、中篇《酒鬼杨石匠的女儿》。崔桦的短篇集《生活拒绝叹息》。刘俊民的中篇《相逢在黑暗尽头》、短篇《月色清明》等。杨字心的长篇《樱花歌妓》、中篇《雾中歌声》和短篇集《女人在失落》。王群生早年写诗,此时期连续出版了《奇妙的旅程》(短篇)、《彩色的夜》(中篇)、《蓝宝石花》、《朋友,我爱你》(长篇)等。此外,张幅的《教授与骑兵》、火箭的《广告的主人》、艾湫的《伯伯》、黄家刚的《老韩》、遥攀的《招蜂姑娘》等短篇小说,都曾在“文革”后全省首次文艺评奖中获奖。

年轻作家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占有突出的位置。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在全省范围内,新人新作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四)成都作家的作品

龚巧明的短篇小说《思念你,桦林》(1986)。她后来在援藏中殉职,遗著有《那雪,像白色的火焰》(1990)。星城(张忠富)的《立体交叉战争》(长篇),获四川首届郭沫若文学奖。乔瑜的《少奖》(收入中短篇集《孽障们的歌》),获四川首届郭沫若文学奖。李宪的《飞越贡嘎岭》(北京十月文艺社出版时改名《大学生变奏曲》),获1988年四川文学奖。中篇小说《白马》(王星泉)、《春,在遥远的山沟》(朱启瑜)、《落花时节》(何洁)、《奇异的旅程》(周永年)、《猎神,走出山谷》(黄放)、短篇小说《唱》(包川)、《高地》(刘家琨)、《白墙》(金平)、《兄弟伙》(周永严)、《叹一口长气》(贺星寒)、《戊戌秋》(王江)、《雾》(徐慧)等均获四川省优秀创作奖。

(五)重庆作家的作品

长篇小说有《忧魂》(余德庄);中篇小说有《飞雪》(陆大猷)、《诗礼人家》(莫怀戚)、《这个城市的初夏》(徐军、石厥仁)、《大河风》(罗学蓬);短篇有《赶场》(陈朝璐),均获四川文学奖。

(六)专县作家作品

绵阳吴因易,有长篇《梨园谱》和反映唐王朝兴衰的历史小说《宫闱惊变》、《天宝狂飚》、《开元盛世》、《魂销骊宫》,

又以武则天为主人公,写了《皇天精魂》、《崔嵬乾坤》、《绝代天后》、《则天大帝》4部长篇。《梨园谱》和《开元盛世》获四川文学奖。此外,还有郁小萍的短篇小说《纤纤素手》,周玉清的长篇历史小说《红楼新续》,达县雁宁的短篇集《巴人村纪事》(其中《牛贩子山道》等曾在省内外获奖)。80年代后期,雁宁与几个青年作者共同化名雪米莉,写了多部通俗流行小说。杨贵云的中篇《血夏》、谭力的短篇《大山无言》,也曾获四川优秀作品奖。南充魏继新,继中篇《燕儿窝之夜》后有短篇《夜河》,西充李一清有短篇《山杠爷》,资中傅恒有中篇《还是那个灰蒙蒙的夜晚》,自贡漆丰有短篇《洗鸭肠子的姑娘》,武志刚有短篇《干姐妹》,泸定高旭帆有短篇《山吼》,富顺廖时香有中篇小说《乐胆》,会东蔡应律有短篇《回声》,德阳林贵祥有短篇《教授和老农》。万县温

传昭有短篇《我有腊梅》,攀枝花市任正平有短篇《第八颗是智齿》等都曾获奖。

(七)部队作家作品

简嘉,继《女炊事班长》后,有中篇《排长》、《四季》。裘山山(女)有短篇《太阳雨》、《梦魇香樟树》。杨景民有中篇《傍黑,离开无人区》。他们都曾多次获过省内外的各种创作奖。

(八)少数民族作家作品

藏族意西泽仁,除短篇集《松耳石项链》获四川首届郭沫若文学奖外,短篇《通向远方的路》、《依姆琼琼》、《野牛》都曾获少数民族创作奖。藏族阿来有短篇集《旧年的血迹》(其中《环山的霞光》获四川文学奖)。此外,诗人木斧(回)、陈川(土家)、苍林(藏)、马寿宇(回)、周辉枝(土家)、巴欠马嘎(彝)等的小说,曾获四川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

第三节 散文和报告文学

一、清末民初散文

清末民初的四川散文,以政论文最为突出。在沈宗元搜集出版的《刘杨合刊》(1914年版)中,《杨叔峤文集》收录赋、论、解共29篇,《衷圣斋文集》收录刘光弟的散文,包括家传、墓志、游记、杂感共54篇,这些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们变法维新的思想。

影响最大的,是稍晚于他们的几位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文章。

《革命军》作者邹容(1885~1905),字蔚丹,巴县人。1902年赴日留学,从事爱国革命活动,参加同盟会。次年携所著文稿《革命军》被逐归国,回到上海租界地,与章太炎、蔡元培组织爱国学社。《革命军》于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有《自序》和章太炎的《序言》。《序言》称它是“义师先声”。鲁迅说:“便是

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革命军》”。

《铁崖文集》 作者雷铁崖(1873~1920),原名雷昭性,富顺自流井(今自贡市)人。1904年9月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创办《鹃声》杂志,所作《中国已亡之铁案说》、《警告全蜀》等文,名震一时。1908年归国后,奔走于沪、杭、川和南洋各地,仍从事报刊工作。他主编的《光华日报》(马来西亚槟榔屿,1910年)和《国民日报》(新加坡,1913年)是当时海外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之一,主要得力于他的政论。据《铁崖文集》所汇,仅《光华日报》上所载即达278篇。1912年底雷铁崖由川返京,北京《民主报》以《大文豪大革命家雷铁崖先生抵京》为题报道,这算时人对他最高的评价了。有《铁崖文集》传世。

其他作品 张澜(1872~1955,南充人)的《说仁说义》、《四勉一戒》、《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保路运动中邓孝可的《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1期),以保路同志会名义发表的《告全国父老书》。朱国琛、刘长述(刘光弟之子)等起草的《川人自保商榷书》,都是文情并茂,影响巨大的热血文字。

二、五四时期散文

“五四”运动兴起,四川散文呈现多

样化发展趋势。

郭沫若 先后出版了《三叶集》(与田汉、宗白华的通讯集,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和抒情散文集《橄榄》(1926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还有带政论性的《水平线下》(1928)和回忆录《北伐》(1937)、《豕蹄》(1936)。

巴金 在抗战前出版了旅法游记《海行杂记》(1932)。归国后有《旅途随笔》、《点滴》、《忆》、《短简》等。

艾芜 从南洋归来后,除写了一系列《缅甸漫画》(1931年,载《时事新报·青光》副刊)外,大多数散文都放在《漂泊杂记》里(1935)。《山中牧歌》(1934)中部分作品也是散文,写的全是作家漂泊途中所见所闻所感。

王光祈 在五四时期写了大量通讯和政论,如《少年中国运动》(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旅欧期间写了《欧游通信》、《李鸿章游俄纪事》(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和上下两册《王光祈旅德存稿》(1936年中华书局)。

李劫人 在留法期间和归国之后,也写了不少通讯、报告和散文,如《李宁在巴黎时》、《鲁渥的画》、《法人最近的归田运动》、《危城追忆》和杂文《乱谈》等,大多收入《李劫人选集》。

浅草、沉钟社几位作家,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发表过不少散文。尤其是陈炜谟,他的《二未堂随笔》,文笔犀利。

留学美国的谢文炳,有《留美写真》

一组和《金山笔记》一组,称得上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文学”。

三、抗战时期的散文和报告文学

郭沫若 从日本归来,先后出版的散文、随笔集有《抗战与觉悟》(1937)、《前线归来》(1938)、《羽书集》(1941)、《蒲剑集》(1942)、《今昔集》(1943)、《沸羹集》(1947)、《天地玄黄》(1947)等。另外有《苏联纪行》(1946)、《少年时代》(1947)、《革命春秋》(1947)、《抗战回忆录》(后题名《洪波曲》,1949)。

巴金 出版有《控诉》(收1931~1937有关抗战散文集,1937年出版)、《梦与醉》(1938)、《旅途通讯》(1939)、《黑土》(1938)、《龙、虎、狗》(1941)、《废园外》(1942)、《旅途杂记》(1946)、《怀念》(1949)、《静夜的悲剧》(1948)。

何其芳 出版过散文集《还乡记》(1943)、《星火集》(1945)、《星火续编》(1949)。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了许多介绍延安的文章,在战时的陪都颇有影响。

沙汀 1939年9月去延安,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1946,题为《随军散记——我所见的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由重庆知识出版社出版)。1958年修改重出题为《记贺龙》和一本通讯报告集《敌后琐记》(1940年10月编完,直到1980年才收入《涓埃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范长江 (1909~1970) 内江人。在抗战时期出版过《中国西北角》、《塞上行》等报告文学集和《川灾勘察记》、《川军与抗战》等实地考察通讯集。

胡兰畦 (1901~) 女,成都人。抗战前发表《在德国的女牢中》,抗战期中,先后出版了《川军在前线》、《淞沪火线上》(1938)、《战地三年》(1940)等通讯报告集。这些作品侧重新闻报导,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散文和报告文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老一辈作家大多从事过通讯、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巴金写朝鲜战争的通讯报告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1952)、《保卫和平的人们》(1953),还有其它一些散文、报告文学收入《新声集》(1959)中。艾芜出版了散文、报告文学集《初春时节》(1958)和《欧行记》(1958)。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在烈火中永生》(1959),曾引起巨大反响。此外,沙汀、柯岗、曾克、李劫人、履冰、李累等,都有这方面的作品,收入《四川十年散文特写选》(1960)。

“大跃进”时期,提倡群众创作,由四川省文联组织创造了一部“新繁县新民主公社史”——《绿树成荫》(1959),是由当地社员口述,经作家记录加工整理的。李累、之光的《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们》写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公馆的罪行,当

时颇受好评,被作为“阶级教育”的材料。

“调整文艺政策”时期,1961~1962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文艺政策”,重新倡导“二百”方针,创作上出现了起色。张秀熟写了《扁豆》、《包谷》。李伏伽有《凌云·大佛·苏东坡》、《夏三虫》,明朗有《巫溪连大江》。张黎群在《成都晚报》开辟《夜谈》专栏发表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杂文。高缨出版了散文集《西昌月》。

1962年10月,随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提出,对作家作品的批判连接不断,刚刚活跃起来的文学创作又归于沉寂。到“文革”开始,四川受到公开点名批判的有李伏伽的《夏三虫》和张黎群的《夜话》等。

1979年以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抒情散文、纪实散文、杂文、随笔等都有很大发展,并出现了长于散文或报告文学的作家。

在老一辈作家中,巴金的《随想录》(五卷)被公认为是新时期重要的散文杰作。沙汀有《杂记与回忆》(1988)。马识途继散文集《西游散记》之后,又出版了杂文集《盛世微言》。流沙河有《锯齿啮痕录》(后收入《流沙河随笔》)。傅仇有《森林炊烟》。高缨有《竹楼的恩情》。宇心有散文集《梦中的记忆》。唐大同有散文集《远方,有一座高峰倒塌》。方赫有《剑门一日》。吴远人有《绿珍珠》。意西泽仁有《帐篷情恩》。陈明云有《金鸡

渡》。杨星火有《亮闪闪的硼砂湖》等。周纲在报告文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出版了《峨嵋魂》、《北战大秦》和《西天一柱》、《生存较量》、《支格阿鲁的子孙们》3部长篇报告文学。其后还有《我,回答共和国》、《东非·半个月亮和半个太阳》。

一批新涌现出来的中青年作家,他们的报告文学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丁隆炎有《在彭总身边》(景希珍口述)。黄济人有《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向义光、张飏有《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岳非丘、邹樾滨有《长河精英》。林亚光有《玛丽·若瑟的故事》。王仲伦有《独钓龙潭》。申万胜、杨景民有《臧雷》。吕齐有《和世界最强手较量》。吴显奎、孟勇有《两弹元勋的秘密历程》。杨潇有《一个中国农民在美国》。杨笑影、叶子玲有《西部奇路上的中国军人》。杨济仁有传记文学《张大千传》。郑赤鹰有《祖国,我为你燃烧》。贺智富、高旭帆有《来自麻疯病区的报告》。谭楷有报告文学集《孤独的跟踪人》。戴善奎有《漂——长江源头探险纪实》等。

中青年作家在散文杂文方面出版的集子,还有《巴山乡趣》(杨永年)、《文坛人物剪影》(刘慧心)、《心灵的跫音》(王敦贤)、《家住长江边》和《三峡鉴赏志》(吕洪文)、《巴蜀小议》(席文举杂文集)、《生活启示录》(叶延滨杂文集)等。

第四节 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

一、清末到民国时期

四川近现代文学批评,发端于吴虞。他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所写的文章,如《吃人与礼教》、《说孝》、《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对儒家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都有批评。《明李卓吾别传》为“名教罪人”李卓吾翻案。《〈松冈小史〉序》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作了充分肯定。在《〈骈文读本〉自序》、《邓寿遐〈灯赋〉序》、《姜方琰〈罗词人评传〉序》中,对多种文学形式和许多作家都有独到的评述。他从现实的需要性上评述文学作品,对旧有的专重词章和训诂的方法持批判态度。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高举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在浪漫主义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建树。20年代中期以后,他介绍革命文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许多创作问题发表过较系统的意见。对诗歌创作和历史剧创作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文论,除《文艺论集》(1925)、《文艺论集续集》(1931)外,《沫若文集》11卷(1959)收入不少单篇文章。

从五四开始,文艺上争论不断,论战的中心在北京、上海。抗战以后,转入重庆,先有关于文艺与抗战的争论(即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有抗战中能否“暴露黑暗”(由张天翼《华威先生》

引起)的争论,有关于民族形式和大众化问题的争论(由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引起)。其后有关于“主观”和“客观”问题的争论(由舒芜《论主观》引起)。许多川籍作家都参加了争论。其中何其芳从延安回到重庆所写的一系列关于现实主义的论文,收入《星火集续篇》(1949)、《关于现实主义》(1950)两本集子中,当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代表作来看待的。

艾芜1941出版的《文学手册》(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次年出增订本),系统介绍文学写作的有关知识,在青年文学爱好者中广为流传。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期,文艺理论工作的重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为中共制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在四川,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通过一些领导者的讲话、报告来体现的。

(一)文选与专著的编辑出版

1959年,由四川省文联编选的《四川十年文学论文选》,收入了胡耀邦《表现新英雄、新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原载《西南文艺》,1951)、廖井丹《站在人民斗争的前列》(《西南文艺》,1951)、

任白戈《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胜利前进》(重庆《新华日报》,1952)、张非垢《为了伟大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明天》(《西南文艺》,1953)、李大章《深入开展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为建立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而努力!》(《草地》,1958)、林采《大力发展群众的文艺创作》(《四川日报》,1958)等。从这些文章中,大致可以看出十年来四川文学发展的历程。

文学批评在扶持新作,尤其是新人的作品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在北京工作的王朝闻(原名王昭文,1909~),四川合江人,1940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以雕塑闻名;同时,也发表文艺评论文章。建国后,他出版了《新艺术创作论》、《喜闻乐见》、《一以当十》、《面向生活》等专著,对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规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十七年,四川评论界出版专著较少,除《四川十年文学论文选》(1959)、《〈达吉和她的父亲〉讨论集》(1962)等多人合集外,只有安旗出版了《新诗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初探》、《论抒人民之情》、《论抒情诗》等5本专著。

由于政治运动不断,文学批评为配合这些运动所展开的对当时认为“错误的”文艺观点和文学作品的批判,持续不断。这些批判,理论孱弱,方式简单,态度粗暴,不仅伤害了一部分创作者的积极性,而且也损害了文学批评的声誉,给创作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

(二)对小说《界限》、《再生记》的“批判”

对短篇小说《界限》(卢耀武著,载重庆《新华日报》1950年8月11、12日)的批判,首开全省,甚至全国批判“私生活”小说的纪录。批判以作者检讨收场,此后再不见他写出什么作品。

对中篇小说《再生记》的批判,规模更大,时间更长,被定为“反动小说”、“黑色小说”。其后,艾芜代表重庆市文联作了《我们的检讨》;《新民报》编辑部作了《对晚报发表〈再生记〉的检讨》;《新华日报》于8月19日发表《关于〈再生记〉的讨论》的综述。“综述”除对作品的批判外,也批评了文艺界的“原则性文艺批评方面的缺乏”。后来虽经过了领导上的指示,仍“存在着麻痹思想”。刘盛亚在批判开始时还参加“慰问团”在朝鲜访问,归国后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51年12月18日在《重庆日报》发表《检讨我在〈再生记〉中所犯的错误》,此事暂告了结。

这段时间,遭受批判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幸福》(载《大众文艺》1951年3月)、《觉醒》(黄贤光,即黄贤俊著,载《大众文艺》1951年8月)、《赵家兴妹》(张达善,即张晓著,载《大众文艺》1951年6月)、《林子与爱情》(遥攀著),中篇小说《牛角湾》(茜子、流沙河著,载《川西农民报》1951年6月3~4日)等。这些批判,是全国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发出来的。被批判的作家大都作了“自我

批评”。这在文艺思想上助长了简单机械的教条主义,文学批评上助长了粗暴的动辄上纲上线的风气。

(三)关于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和反“无冲突”理论的争论

50年代初,文学创作上严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在文艺界内外都有共识。1953年9月23日~10月7日,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与同时召开的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都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议题讨论。

四川省首届文代会是在这之前(1952年底)召开的,会议上也曾提到过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但不是重要的议题,会议主旨是“继续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普及第一的方针”和“发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强调作家要克服“三个脱离”的偏向(三脱离即脱离政治、脱离生活、脱离群众)。

文学创作上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落后”现状,文艺界认识是一致的,但认为造成落后原因主要是“客观上是有‘禁忌’”,“不敢按照生活的真实情况去写作”,“不敢揭露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只有清除“无冲突理论”的影响,文学才能健康发展。另一部分人认为,创作落后的原因是作家主观上“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不够”,“存在‘三脱离’的现象”,“西南的文艺界并没有什么‘无冲突论’君临一切,凡有‘冲突’的作品,皆在‘禁忌’之列的情况。”

《西南文艺》的理论编辑游葵写了

《应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代替粗暴和武断的不良作风》,文章没有得到及时披露。直到1957年7月,才在改刊后的《红岩》发表,此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这篇文章,自然也就成了将作者打为“右派”的依据,一些支持“反‘无冲突论’的人”被划入“反党的小集团”,遭迫害。

(四)关于《草木篇》的争论

1957年,文学界发生了对《草木篇》的争论。这是全省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泛的一次论争。

组诗《草木篇》(流沙河著,《星星》诗刊1957年1月创刊号),全诗分五小节,诗引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借“草木”以表达立身处世之道。

《星星》出版的当日,《四川日报》便发表了批评《草木篇》的文章,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接着《成都日报》、《重庆日报》、《草地》、《红岩》都相继发表批评文章。省文联于2月8日和12日连续召开两次讨论会,会上,否定的意见占上风,但也有少数反批评的意见。据统计,1~3月,省级报刊共登批评《草木篇》文章22篇,反批评文章只有一篇。5月,争论在中共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期间达到高潮,对前一段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到了“反右”运动展开后,6月21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标题下,全文转载《草木篇》并加《编者按》。此后,《人民日报》、《文艺报》、《诗刊》、《文艺学习》等都登载了一

些知名作家、评论家批判《草木篇》的文章,给作品和作者扣上“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帽子,并由此确定四川文艺界有一个“反党集团”。

除在报章上被点名的人外,全省不少地区和单位,凡是支持过《草木篇》的,都遭追究,有的人因此而被定为“右派”。

(五)关于“诗歌下放”的讨论

1958年4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搜集民歌民谣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诗词歌曲,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诗,才可能更为人民群众所欢迎。”“通知”发出后,四川全省各地掀起了一场创作、搜集、整理出版“新民歌”的热潮,《星星》诗刊也同时开展了“诗歌下放”的讨论,由四川推向全国。《人民日报》社于1959年1月16日、21日连续召开座谈会,《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诗刊》、《文学评论》等纷纷开辟专栏,争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关于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问题;关于新民歌的发展和提高问题;关于诗歌的形式问题,包括民族形式和现代格律诗等问题;关于五四以来新诗运动的估价问题。

(六)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争论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著),写汉族老汉任秉清辗转于凉山彝族居住区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妞妞,认定彝族老人马赫尔哈的养女达吉就是。两位老人为争夺女儿发生尖锐冲突,后经汉族

干部的调解,矛盾得到解决。1960年,作者将它改编,并由峨影厂拍成电影。电影比小说有较大改变。任秉清成了工程师,马赫成了公社社长,任在支援彝族地区建设中发现了马赫的养女就是自己亲生女儿,两位老人相互谦让,矛盾得到解决。

电影一出,众说纷纭,有肯定电影否定小说的,有肯定小说否定电影的,也有既肯定电影也肯定小说的。从1961年2月起,《电影文学》、《文艺报》、《四川日报》、《四川文学》相继发表文章,持续了一年之久。1962年10月,中国作协四川分会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达吉和她的父亲〉讨论集》,收入论文34篇,全国的著名评论家和电影艺术家如冯牧、李希凡、谢飞、黄宗英和四川评论界人士,都参加了讨论。争论中涉及典型人物的塑造、时代精神的体现,以及怎样看待人性、人情等文艺美学的重要问题。

(七)“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

1965年,在全国报刊开展对四川籍老作家陈翔鹤《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等短篇小说和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批判的时期,四川便开始了对李伏伽短篇小说《师道》的批判。最初的批判还主要集中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上。以后逐步升级,对作者本人及1962年所写的三篇小说、三篇散文,无限上纲,号召“主要从政治上揭露和粉碎他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文

革”开始后对“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的批判才冲淡了对李伏伽的批判。四川十七年的文学作品,或受批判,或遭封存,成了“一片空白”,文学批评,成了篡权的舆论工具。

三、新时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四川文学批评界很快投入清算“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工作中,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根本任务论”、“三突出论”、“黑线专政论”以及他们利用文艺搞阴谋活动的罪恶行径的文章,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十年里,在文艺理论、作家作品研究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一)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郭沫若研究:有《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李保均著,1984)、《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谭洛非、文天行、秦川、廖全京、马仁可合著,1984)。另外,四川郭沫若研究会(乐山)编辑出版了《郭沫若研究》专刊(季刊)。

李劫人研究:有《李劫人的生平和创作》(李士文著,1986)、《李劫人传略》(王锦厚、伍加仑著,1983)、《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论文集,成都市文联创作室编,1989)。另外,四川大学《学报》出版了《李劫人研究》专辑(1983)。

巴金研究:有《巴金的生平和创作》(谭兴国著,1983)、《巴金研究论集》

(1986)、《巴金美学思想论稿》(谭洛非、谭兴国著,1990)。

沙汀研究:有《沙汀小说艺术探微》(李庆信著,1987)。此外,绵阳师专编辑出版不定期内刊《沙汀研究》。

艾芜研究:有《艾芜生平和创作》(谭兴国著,1986)。

何其芳研究:有《何其芳评传》(尹在勤著,1980)。万县师专编辑出版了内刊《何其芳研究》。

此外,对多位作家作品的研究专辑有:《四川现代作家研究》(四川社科院文学所编,论文集,1983)、《西南中青年作家论》(论文集,1982)。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其中有《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火热的小说世界》(文天行著)、《大后方散文论稿》(尹鸿禄著)、《大后方的通俗文艺》(杨中著)、《抗战诗歌史稿》(苏光文著)、《战火中的文学沉思》(吴野著)。另外,《殷白评论集》、《杨更生评论选》中也收有对四川现当作家研究的文章。

(二)美学和文艺学研究

出版的专著有:《文艺美学论集》、《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苏鸿昌著,1986)、《文艺美学论集》、《审美学》、《美学辞典》(王世德著、编,1985~1989)、《美学原理基础》、《美的审美》(李敬敏著,1988、1989)、《中国古典美学探索》、《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皮朝纲著,1985)、《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1988)。

文艺学方面有《文艺学基础》、《文学批评研究》(唐正序著,1983)、《文艺学原理新论》(苏恒、李敬敏著,1989)、《文学与意境》(苏恒著,1989)。

四川社科院文学所先后还编辑出版了《大众美学》、《美学文摘》、《艺术美学文摘》、《美学新潮》。重庆市文联和西师中文系、重庆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美的研究和欣赏》。

(三)创作研究和鉴赏

在诗歌研究方面,西南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新诗研究所(1986年),有《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新诗文体学》、《中国现代诗学》(吕进著,1982~1991)等。另外有《文学新潮》(石天河著,1986)、《新诗漫谈》、《诗人心理构架》(尹在勤著,1983~1987)、《台湾诗人十二家》、《十二象》(流沙河著,1986)。

小说研究和鉴赏有:《小说写作研究》(李保均著,1984)、《细节描写浅谈》(左人著,1983)、《文学欣赏漫谈》(吴野著,1980)、《阅读与写作》(殷白著)、《写作技巧探微》(谭兴国著,1983)。

儿童文学研究有《儿童文学散论》(彭斯远著,1985)。

(四)古典文学研究

《学不已集杂著》(论文集,杨明照著,1985)、《山海经校注》(袁珂著,1980)、《苏轼评传》(曾枣庄著,1982)、《周邦彦评传》(白敦仁著,1985)。

此一时期,有一大批文学评论的新人,他们暂时尚无专集问世,但他们的论文大多关注当代文学创作的热点问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曾获四川省文学奖。如《超越盆地眼光,强化自主意识》(毛迅、易丹、陈庄、罗建中著,1986)、《论民俗小说的美学特征》(刘火著,1986)、《〈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之研究》(冯宪光著,1984)、《并非偶然的恋旧——‘寻根热’兴发的心理轨迹》(向荣著,1986)、《近年来小说中三种人生主题的比较》(苏丁著,1987)、《在历史的多变中把握当代人性格》(黄舒著,1984)、《民族文化与民族魂》(陈伯君著,1987)、《生命终点的反思》(李明泉著,1988)、《从神的膜拜到人的讴歌》(曹万生著,1985)等。

第三章 文学团体、刊物及重要活动

第一节 文学团体和刊物

近代四川文学的发展是和报业的发展相联系的,戊戌变法以前,四川没有报纸,传递信息靠各州驻省的京报和辕门抄,变法维新以后,《渝报》和《新蜀报》先后创办。在四川保路运动中,铁路公司拨款创办的《西顾报》、《白话报》、《启智画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和省咨议局办的《蜀报》上,都经常刊登一些通俗易懂的诗歌、散文、漫画,民间歌谣和曲艺作品,像《告全国父老》、《铁路醒心歌》、《铁路公司开会纪事诗》等在民众中都颇有影响,收到了用文艺开启民智的效果。

辛亥革命前后,公私报纸成批涌出,《四川公报》、《群报》、《国民公报》、《通俗日报》、《西蜀新闻》、《晨钟报》等,都刊载了大量文学作品,有诗、散文、也有小说。《四川公报》在1914年夏到1915年秋,每月都出版两期“特别增刊”《娱闲录》,可以说是四川最早的文艺刊物,吴虞的诗、散文、评论,经常刊登在上面,李劫人早期短篇小说《儿

时影》在该刊2卷1~3期连载。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京华日报》记者川人周太玄和《川报》驻京特约通讯员王光祈,很快发回消息和报导,在李劫人主办的《川报》上登出,立即在成都引起强烈反响。接着,有数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诞生,正式拉开了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星期日》周刊 由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主办,李劫人任编辑,1919年7月13日创刊,1920年7月停刊。撰稿人除本省吴虞外,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全国新文化领头人都曾给它写稿。吴虞《吃人与礼教》,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等重要文章都是首先在该刊登出,再由《新青年》转载,是五四时期全国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

《四川学生潮》周刊 由全省学联主办,袁诗尧为编辑,1920年5月23日创

办,共出 19 期。

《威克烈》周刊 由外国语专门学校学生邓奎皋等在吴虞指导下创办,1919 年 12 月创刊。

《半月》刊 主要由外专学生吴先忧、李芾甘(巴金)和高师的袁诗尧编辑。1920 年 8 月 1 日创刊,共出 24 期。

《直觉》半月刊 高师及附中学生创刊于 1920 年的一个文艺性刊物。

前四种刊物都是综合性的,主要针对社会现实问题发表文章,倡导“文学革命”是其中一个重要题目。比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介绍西方一些艺术作品,同时也登载一些新文艺创作、诗、散文,甚至还有四川最早的话剧剧本。《直觉》是纯文艺刊物,重点偏重男女恋爱、婚姻自主方面的问题。

这些刊物维持的时间都不长,但影响颇深,正是它们和《新青年》等刊物,哺育了一代新人,也培养了一代新作家。著名作家巴金、艾芜在回忆自己成长过程时,都称自己是吃“五四”的乳汁长大的,而且都提到《星期日》、《学生潮》、《直觉》对自己的影响。

《文艺月刊》 北京“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四川引起强烈反响,蜀中文艺开始活跃起来,最先兴起的是“校园文艺”。四川大学以“文艺研究会”为核心,团结了一批文学青年如方敬、蔡天心、张宣(羊角)、陈思苓、袁圣时(袁珂)等,先后得到进步教师如刘大杰、朱光潜、谢文炳、罗念生、卞之琳等的指导,出版《文艺

月刊》、《半月文艺》。鲁迅病故后,这批文学青年发起召开了成都各界追悼鲁迅大会。

《活路》旬刊及《星芒》周报 诞生于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在成都也建立起来,主要成员来自四川大学和省立成都师范等学校。他们创办《活路》旬刊(后改为《大声》周刊、《大生》),出《星芒》周报。

《星芒救亡联合周刊》 “七·七”事变后,校园文艺走向社会,《大生》周刊改出《图存》周刊。《星芒》和四川青年救国会主办的《救亡》合并为《星芒救亡联合周报》。原川大学生办的《文艺月刊》与《金箭周刊》合并为《金箭》月刊(1938 年 8 月创刊,主编为陈照葵),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向全国发行,是抗战初期成都地区有一定影响的文艺刊物。

“抗敌文协” 1938 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文学社团来到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抗敌文协”),1938 年 3 月成立于武汉,9 月总会迁重庆。从成立之日起,老舍便担任总务部主任,主持会务,团结各方面的文艺界人士,对推动抗战时期的文艺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重庆,总会定期举办各种座谈、交流会。在鲁迅忌日和郭沫若诞生 50 周年、茅盾诞生 50 周年、老舍创作 20 周年,都举办过各种不同形式的集会活动。抗战后期,沦陷区的作家颠沛流离,许多作家陷入贫病交加的绝境,“抗敌文协”在救助流亡来

川的作家和发动捐助贫病作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据重庆市图书馆编印的《抗战期间重庆版文艺期刊篇名索引》统计,抗战期间,迁来重庆或在重庆创办的刊物(文艺刊物和包括文艺的综合性刊物)共有53种,重要的有:

《抗战文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办。1938年5月在武汉创刊,9月随总会迁重庆,到1946年5月终刊,共出73期。《文艺阵地》茅盾主编(1938.4~1944.3)。《七月》(1937.10~1941.9)、《希望》(1945~1946.5),胡风主编。《文艺先锋》(1942.10~1948.9),是办刊时间较长的杂志,由王进珊、丁伯骝等编辑。

此外,由郭沫若主编的《中原》(1943.4~1945.10)、王鲁彦、荃麟主编的《文艺杂志》、葛琴主编的《青年文艺》(1942.10~1945.2)、孙晋三主编的《时与潮文艺》(1943.3~1945.2)、孔罗荪主编的《文学月报》(1940.1~1941.12)、熊佛西主编的《文学创作》(1944.7~)、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1943.7~1944.1)、中国文艺社主编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37.10~1941.11)等,都是坚持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

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 抗战爆发后,原在上海“左联”工作的周文、沙汀相继回川。在他们的组织联络下,把先前在川和新近回来的文学工作者团结起来。1937年10月,建立起成都文化界救亡协

会,由周文、李劫人领头。1938年元旦,他们以“文艺界联谊会”的形式聚会,参加的除沙汀、周文外,还有早在成都工作的李劫人、陈翔鹤、朱光潜、谢文炳、卞之琳、罗念生、毛波和新近到成都的马宗融、罗淑、邓均吾、曹葆华、陈敬容、任钧等共20余人。后来,周文和蔡天心发起成立的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扩大到100余人,把先前在《金箭》、《星芒》、《战旗》等刊物的文学青年都联合起来,推举马宗融、沙汀、周文、任均、蔡天心、羊角等11人为筹备委员,发表《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发起意见书》。

抗敌文协成都分会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成都的周文、朱光潜被选为理事。5月,抗敌文协成都分会成立筹备组,推周文、李劫人、朱光潜、罗念生、马宗融为筹备员,但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立案。直到1939年1月,老舍陪冯玉祥到成都,在他们的支持下,成都分会于14日开成立大会,正式成立,推李劫人、肖军、周文、罗念生、谢文炳、刘开渠等为理事,并决定出版会刊《笔阵》(1939.3~1944.5,共出30期)。从此以后,“抗敌文协”承担了组织、协调成都文艺工作的重任。抗战胜利后“抗敌文协”改名“文协”,直至四川解放。会员最多时达300人,最少时也有100余人。

1939年,沙汀、周文相继离川后,“文协”具体工作主要由陈翔鹤、陈白尘、叶丁易等人承担。李劫人和后来的叶

圣陶,是大家公认的“旗帜”。先后在成都文协担任理事的,还有沙汀、刘盛亚、赵其文、肖蔓若、陈翔鹤、王余杞、王冰洋、陶雄、厉歌天、苏小涵、洪毅然、罗永培等。

在“抗敌文协分会”的筹组过程中,成都地区的文学社团和刊物也纷纷出现,如《文艺后防》、《朔风》、《野马》、《挥戈文艺》、《四川风景》、《燕风文艺》、《华西文艺》、《诗与散文》、《诗星》、《拓荒》等等。其中《文艺后防》、《华西文艺》和《华西晚报》的《文艺副刊》影响较大。

中华文协重庆分会 抗战结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迁走,重庆改为分会,由何其芳、沙汀、艾芜、聂绀弩、沈起予、力扬、萧蔓若任理事,刊物有《萌芽》(1946.7~8月,艾芜名义上作主编,实际工作由何其芳负责)、《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1946.1~5月,叶以群编辑)。另外还在重庆《大公报》上开办《半月文艺》副刊,由艾芜负责编辑(1946.10~1947.8)和在《新民报》开办的《诗刊》,由柳倩编辑。

中华文协成都分会 文协成都分会在作家纷纷离开后,以李劫人为核心,继续坚持下来。重庆较场口事件、昆明事件、文协分会都开会声援。分会会员参加一些报纸副刊编辑如《西方日报·每周文艺》(刘盛亚)、《四川日报·华阳国志》(李劫人、洪钟)、《新新新闻·柳丝副刊》(洪钟)。“文协”会员、李劫人的秘书谢扬青

创办了《风土杂志》。解放前夕,李劫人代表文协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成都分会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的文章。

文联常委会与西南文协 1949年以前,全省没有统一的文学组织。“文协”重庆分会和成都分会,只是部分作家参加的松散的团体。1949年12月1日,重庆刚解放,便成立“文艺协会重庆分会复会筹委会”,发表复会“宣言”。到1951年1月29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宣告“文协”重庆分会成立,与重庆市文联筹委会、西南文联筹委会合署办公。主要领导有任白戈、沙汀、艾芜、曾克、邵子南等。1951年7月,创办《说古唱今》通俗文艺月刊。8月,创办《西南文艺》。成都文协于1950年2月22日正式成立,与成都市文联筹委会、川西区文联筹委会合署办公,主要领导有沙汀、李劫人、陈翔鹤、西戎等。1950年2月创办《川西文艺》,9月创办《说唱报》,1952年10月合刊为《四川文艺》。

与此同时,川北、川南、川东,都分别于1950年、1951年在南充、泸州、北碚先后成立文联筹委会。川北文联(筹)还创办了《川北文艺》、《新说唱》、《川北画报》等报物,没有单独成立“文协”。

1953年1月,四川省文联成立,由沙汀任主席,李劫人、陈翔鹤、段可情、常苏民为副主席,《四川文艺》改名《群众文艺》。文协以文学为主,同时包括音协、剧协(美协设在重庆)。到此,四川各行政区文联及文联(筹)均撤销。

成渝两地文协于1953年4月统归于西南文协。由沙汀任主席,艾芜、邵子南等为副主席。会员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作家,以《西南文艺》为机关刊物。

四川文联与四川作协的刊物 1954年11月,大区撤销后,西南文协改名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西南文艺》归重庆分会领导。原西康省文联合并入四川省文联。1956年5月,中国作协重庆分会召开首届会员大会,来自西南各省的代表,选出沙汀为主席,李劫人、蹇先艾、邓均吾、曾克为副主席。7月,《西南文艺》更名为《红岩》。四川省文联办的《群众文艺》更名《草地》。1957年1月,省文联创办《星星》诗刊。“反右”运动中,四川作家遭受沉重打击,《星星》诗刊几位编辑都被打成“右派”,改组后由李累任主编。1959年8月,作协重庆分会更名“作协四川分会”,会址迁成都与省文联合署办公,《红岩》与《草地》合刊改名《峨眉》。主编沙汀、副主编曾克、李友欣。重庆市文联保留,出版《奔腾》文艺月刊。次年5月,《峨眉》改名《四川文艺》。

1961年4月,《星星》和《四川文艺》合并改名《四川文学》,沙汀为主编,李友欣、李累为副主编。1964年底“四清”运动中,《四川文学》停刊整顿,次年7月复刊,主编沙汀、副主编曾克、安旗。

1966年5月,省委派出工作组驻文联。文联和作协被认为是“黑线专政”的重点,有一条“马(马识途,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李亚群,时任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沙(沙汀,时任文联和作协主席)的黑线”,“背着省委,上通周扬、下接文联党组”。全省报刊的批判文章不下百篇。

11月,群众组织兴起,协会工作全面瘫痪。1967年1月,群众组织宣布夺权。年中,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准成立了“斗批改领导小组”,随即迁往大邑安仁镇学习班,和省级文艺单位一道进行“斗、批、改”。

1969年底~1972年,全体员工到四川米易县“省级机关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斗、批、改”。

1972年下半年,开始筹备出版《四川文艺》,共出3期试刊号,1973年1月正式复刊。复刊号发表的老作家艾芜短篇小说《高高的山上》,被“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内刊”点名批判,省内一些报刊也相继发表批判文章。粉碎“四人帮”之后,组织全省文学工作的任务,主要由《四川文艺》编辑部承担。1976年11月1日,编辑部召开了成都市部分作家作者的座谈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沙汀、艾芜等老一辈作家和几十位在蓉的中青年作家到会,是“文革”之后四川文学界首次集会。

1978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邀集全省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宣布成立文联和各协会筹备组,由李少言任组长,恢复文联和各协会工作。此时,作协会员共120多人(含全国会员25人)。

1979年9月,改《四川文艺》为《四川

文学》，归作协领导，李友欣任主编。

同年9月，《红岩》在重庆复刊，改为大型文学双月刊，王觉任主编。10月，《星星》复刊，白航任主编。

1980年6月，在全省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召开了作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艾芜为名誉主席，马识途为主席，方敬、杨明照、李友欣、王觉、高缨、杨益言、陈之光、吴琪拉达(彝)等8人为副主席。建立了青年作者工作委员会、儿童文学工作委员会、文学评论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



1980年，著名导演谢晋与沙汀、艾芜在一起

1982年5月，由作协分会和省社科院共同主办的文学评论刊物《文谭》创刊(内部发行)，李友欣、吴野、谭兴国组成领导小组。1984年，改名《当代文坛》正式公开发行，归作协领导。它是全国最早创办的省级文学评论刊物。同时，《四

川文学》改名《现代作家》，陈进任主编。

1985年9月，经省委批准，作协四川分会和省文联分开，单列建制，下设《现代作家》编辑部、《星星》诗刊编辑部、《当代文坛》编辑部、文学院、创作联络部和创作研究室(负责内刊《四川作家通讯》

的编辑工作)及有关行政办事机构。

市地州的刊物 各地市州纷纷创办文学刊物,其中公开发行的有《青年作家》(成都,1981)、《攀枝花文艺》(攀枝花市)、《巴山文艺》(达县)、《剑南文艺》(绵阳),此外,《沱江文艺》(内江)、《嘉陵江文艺》(南充)也办了一段时间,少数民族

地区创办了《贡嘎山》(甘孜)、《新草地》(阿坝)、《凉山文艺》(西昌)。

从1982年起,各地、市、州文联建立,有的建立了作协或作协小组。重庆市于1982年成立了重庆市作协,成都建立了作协筹备组。此后,达县、绵阳、内江、乐山等地都在文联内建立了作协小组。

第二节 文学评奖

一、四川作家在全国评奖中获奖的作品

(一)小说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2);包川《办婚事的年轻人》获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一届短篇小说奖(1980);魏继新《燕儿窝之夜》获中国作协第二届中篇小说奖(1982);周克芹《勿忘草》获第二届短篇小说奖(1981);《山月不知心里事》获第三届短篇小说奖;简嘉的《女炊事班长》获1981年全国优秀创作奖。

(二)报告文学

向义光、张飏的《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岳非丘、邹樾滨的《长河精英》、林亚光的《玛丽·若瑟的故事》分获中国作协第二届(1982)、第三届(1983)报告文学奖;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1983)。

(三)诗歌

傅天琳的《汗水》、流沙河的《故园六

咏》、杨牧的《我是青年》、叶延滨的《干妈》、骆耕野的《不满》、雁翼的《在工业区拾到的抒情诗》获中国作协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流沙河的《流沙河诗集》、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分别获得第一届(1970~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一等奖与二等奖。杨牧的《复活的海》、李钢的《白玫瑰》获得第二届(1983~1984)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叶延滨诗集《二重奏》、吉狄马加诗集《初恋的歌》获第三届(1985~1986)新诗(诗集)奖。

(四)编辑

1987年,原《星星》诗刊主编白航获中国作协首届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

二、四川省设立的主要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奖

(一)综合性艺术评奖

1981年8月,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联合举办全省综合性

文艺评奖,是为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老中青三代作家焕发新的创作活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创作大批优秀作品的集中展示。其中,获奖文学作品共95件,包括后来在全国获奖的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高缨的《云崖初暖》,化石的《潘家堡子》,克非的《山河颂》,吴因易的《梨园谱》等长篇;丁隆炎(景希珍口述)的报告文学《在彭总身边》;陈朝璐、榴红、李伏伽、周永年、徐慧的短篇小说等。

(二)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和四川省文学奖

1985年8月,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拨款30万元,设立四川省郭沫若文学奖。年底举行的分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通过了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和四川省文学奖简章及评委名单,由马识途、李致担任评委会正、副主任。1988年3月,共评出四川省郭沫若文学奖7项,四川文学奖142项,同时选出优秀编辑21人,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13人和先进集体5个。获四川省郭沫若奖的有长篇2部:王火《月落乌啼霜满天》、星城《立体交叉战争》;中篇2部:乔瑜《少将》、周克芹《二丫和落魄秀才》;短篇1部:意西泽仁《松耳石项链》;报告文学1部: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诗集1部:周剑《大渡河情思》。

老一辈作家沙汀、艾芜、马识途、方敬、叶石、王觉等获荣誉奖。

(三)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在四川省政府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两年一次),文学方面获奖的有:

1984年10月,首届获一等奖的是袁珂的《山海经校注》;二等奖有吕进的《新诗创作与欣赏》、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和创作》等18项。

1986年10月,二届获二等奖的有《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谭洛非、文天行、秦川、廖全京、马仁可等合著)、《文艺美学论集》(王世德著)。

1988年,第三届获奖的有:二等奖《文学批评研究》(唐正序)、《文艺心理与美育心理》(刘兆吉)。

1990年,第四届获奖的有:二等奖《曹禺剧作艺术探索》(华忱之)等。

此外,重庆市文联和作协设立了重庆市文学创作优秀成果奖,成都市文联设立了金芙蓉文学奖,一些地、市、州、县都分别设立了文学奖,鼓励本地作者。有些期刊、报纸还设立了单项奖励。

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对少数民族作家,除在上述全国和全省性评奖活动中评奖外,还专设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984年7月,西藏、青海、甘肃、广西、四川五省区藏族文学(汉文)评奖,评选出优秀作品41件,四川省12件。

1985年10月,作协与省民委、省文联联合主持召开五省(云、贵、川、青海、甘肃)藏族文学创作会议,评选出104件

藏族作者的作品,给以奖励。1985年12月,由国家民委、中国作协联合举办的第二届(1981~198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彝族吉狄马加的诗集《自画像及其它》获诗歌一等奖,藏族意西泽仁

《依姆琼琼》、羌族谷应龙《飘逝的花瓣》和彝族杨阿洛的彝文作品《根与花》获短篇小说二等奖。第三届(1985~1990)有木斧、意西泽仁、何小竹、何健、保伍拉且获奖。

第三节 重要的文学活动

一、创作讨论会和讲习班

1980年11月26~12月3日,由作协四川分会、省民委、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召开了四川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出席的有藏、彝、羌、回、苗、土家等各族作者和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作者、编辑共80余人。会议提出了发展全省少数民族文学的各项措施。

1981年11月11~18日,由作协四川分会、省文联和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文艺评论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评论家和各报刊、出版部门文艺编辑共90余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沈一之代表宣传部宣布:“由四川省文联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共同筹组四川省文艺评论委员会,作为今后开展文艺评论工作的组织联络机构;……并确定由四川省文联办一个文艺评论的内部刊物,先行试刊,以后争取公开发行”。会上还决定当年5月举办一次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

1981年11月20~1982年1月20

日,作协分会在新都荣军休养院(即龙藏寺)举办首期文学创作讲习班。来自全省各地55位年轻作者参加。1982年6月27日~8月10日,又在同一地点举办第二期,正式定名为“青年作者文学讲习班”。学员41人中有35人是已经发表作品的初学写作者。次年,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三期讲习班,参加这三次“讲习班”的,有一大批是活跃于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如魏继新、谭力、雁宁、杨贵云、陆大猷、林贵祥、傅恒等,他们有些获奖作品是在“讲习班”中写成的。

1938年8月22~27日,由作协和团省委、省总工会联合召开了规模较大的四川省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省各地、各民族的文学青年300余人。四川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谭启龙、聂荣贵在会上讲了话。老作家艾芜、任白戈传授了他们的写作经验并回答青年作者提出的问题。马识途在开幕词中说:“这是……四川文学界第三梯队的一次盛大检阅。”

二、文学院

1983年7月15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准建立省作协文学院,报省有关部门单列编制并拨专款。8月正式成立,由艾芜任名誉院长,马识途任院长。文学院从成立时起,聘请业余作家脱产1~2年为创作员。这批创作员多是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如黄济人、魏继新、吉狄马加、意西泽仁、傅天琳等。

三、作家作品研讨会

1983年3月11~15日,作协分会与省社科院、四川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了李劫人作品学术讨论会。来自山东、湖北和四川各地的文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者47人到会,1987年和1991年,由成都市政府、市文联先后两次召开关于李劫人小说艺术的研究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李劫人小说的史诗追求》(成都出版社出版)。

1985年5月22~28日,由作协分会、省文联、省社科院联合在成都召开了川籍老作家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创作学术讨论会,来自16个省、市、自治区的120多位学者专家到会。在此之前,省社科院文学所编辑出版了《四川现代作家研究集》。1986年,重庆出版社又出版了《巴金研究论集》。

1982年11月16日,为纪念郭沫若诞辰90周年,在乐山举办了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80个单位的160多人到

会。会议期间,成立了以乐山为中心的郭沫若研究学会,开始出版《会刊》。次年10月,在成都再次举办郭沫若学术座谈会,并成立四川省郭沫若研究学会。1984年10月18~24日郭沫若研究学会(乐山)还与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学会联合举办“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专题学术讨论会,出版了《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学术研究论文集》。次年,又举行“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以后几乎每年都定期举行讨论会。四川大学中文系、乐山师专中文系,分别成立了郭沫若研究室。

1986年10月12~15日,由万县市发起,举办全国第一届何其芳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50人与会。出版了《何其芳研究》的不定期内部刊物,会上决定设立何其芳青年文学评论奖励基金会。

1990年3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省作协、省新闻出版局联合举办座谈会,祝贺《艾芜文集》(十卷本)出版暨艾芜创作66周年,冯牧代表中国作协专程莅会。

四、文学交流

“文化大革命”以前,四川作家除沙汀、艾芜、戈壁舟、高缨等少数人参加全国作协组织的赴外访问团之外,很少对外交流。1980年后,根据中国作协和有关部门安排,四川作家艾芜、马识途、方敬、杨益言、周克芹、孙静轩、梁上泉、流

沙河、傅天琳、杨牧、吉狄马加、徐康、意西泽仁等都曾出国访问。省作协还组团访问香港。与此同时,先后接待了以水上勉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日本神风派诗吟访华团,泰国诗人访华团,旅美台湾作家访问团,新加坡华人作家联谊会访华团,香港作家访问团,以索尔兹伯里先生为团长的美国作家代表团,聂华

苓、於梨华等海外知名作家,法国作家罗布莱斯等。

从1986年起,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的作协共同商定,轮流在各省举办“西南五省作家笔会”。首轮笔会于1986年5月18~22日由四川作协承办,在蜀南竹海举行,艾芜、蹇先艾、马识途、李乔等70余位老中青年家参加。